



浙江近代海洋文明史

晚清卷

陈君静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课题

“浙江近代海洋文明史”（11JDHY01Z）最终成果

浙江近代海洋文明史（晚清卷）

陈君静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近代海洋文明史·晚清卷 / 陈君静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3422-4

I. ①浙… II. ①陈… III. ①海洋—文化史—浙江—
清后期 IV. ①P7-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006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浙江近代海洋文明史（晚清卷）

陈君静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3422 - 4

2017年5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0 字数 323 千

定价：60.00 元

总序

近代西方学术史与研究方法的传入使得中国的历史学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大陆史观，开始认识到中华文明的传承除了农耕文明外，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兴衰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自大一统的秦朝建立之后，中华文明已经从中原开始向草原和海洋扩张，东南沿海的文明进程在与农耕文明的交互影响中缓慢发展。经历两次人口迁移和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后，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区域的海洋经济发展呈加速趋势，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与社会形态则构成了中国海洋文明的轮廓。与此同时，中华文明政治领域中涉及海洋的顶层架构则在农耕政权收编与控制海洋区域的进程中逐步完成。中国农耕文明的强大使得海洋文明的发展很难像欧美国家一样成为区域文明与世俗政权的主导力量，这也是中国海洋文明与欧美海洋文明发展差异所在。

中国近代海洋文明在西方文明侵入下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过程，它在与农耕文明同步转型并借鉴欧美海洋文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当代中国海洋文明演进的独特轨迹。在中国海洋文明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近代浙江海洋文明的历史演变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

作为东南沿海的主要省份，浙江的海洋文明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孕育，并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演进。资源贫乏、人多地少的困境使得浙江沿海居民纷纷下海，通过海洋资源开发与贸易拓展以获取粮食、食盐等生活与生产资料。近海与远洋贸易使得浙江沿海的城乡发展与生产活动带有明显的海洋痕迹。以港口和贸易线路为纽带，浙江的社会发展已经融入东亚海洋文明发展中。而农耕

政权的强大使得古代浙江的海洋文明发展受到极大制约。直到外力冲击下，近代浙江海洋文明的发展才获得国家政权力量的支持。在中外文明冲突与相互影响中，近代浙江沿海经济的转型比内地省份更加灵活和彻底。而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江商人群体在浙江乃至全国的近代经济转型与制度重建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近代以来，中国涉及海洋制度的构建则是在清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更迭中逐次完善起来的。与此同时，作为浙江海洋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各海洋经济产业的转型呈现出先后次序。浙江海洋贸易的合法发展自晚清开埠后就迅速崛起，而海洋渔业的现代转型发端于20世纪初期，受国家管控最为严格的海洋盐业则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出现实质性的改进。与经济转型的缓慢相比，浙江交通运输建设与文化交流更为迅速。新式港口的建立和现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使得浙江沿海人口与商品的流动速度与辐射区域呈阶梯增长态势。在外来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推动下，近代浙江沿海城乡社会新陈代谢的进程明显加快，以通商口岸为代表的沿海地区文化转型也取得显著成效。

《浙江近代海洋文明史》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以海洋政策变迁、经济转型、社会重建为主线，揭示近代浙江海洋文明发展进程。具体则涵盖沿海政权更迭与军事冲突、海关与海警、渔盐产业与临港工业孕育、交通运输与海洋贸易、沿海城乡变迁与海洋灾害应对、社会结构与信仰习俗演变、外来文明影响与作用、涉海教育与科技等诸多领域，力图呈现浙江近代海洋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与丰富内涵及其在近代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变迁中的重要地位。由于是拓荒之作，本书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憾。但21世纪是人类全面认识、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世纪，现实召唤我们更加重视海洋历史诸问题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其筚路蓝缕之功与勇气更应该值得肯定。

是为序。



2016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浙江沿海自然环境与沿海地域社会	1
第一节 开埠前浙江沿海环境、资源与交通	1
一、自然环境	1
二、沿海资源	3
三、沿海交通	7
第二节 清政府海洋政策调整及影响	11
一、浙江沿海的海盗问题	11
二、清政府对海洋政策的调整	12
三、海洋政策调整对传统海洋经济的影响	16
第三节 人口与人口流动	21
一、人口与人口流动	21
二、海洋民众的活动区域	26
第二章 浙江沿海地区海防建设与中外战争	31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浙江海防	31
一、“门户”与“藩篱”	31
二、海防制度	33
三、海防部署与海防对象	37

第二节 鸦片战争与浙江传统海防体系的崩溃 41

一、定海陷落 41

二、定海再次陷落 44

三、传统海防体系的崩溃 46

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浙江海防 49

一、洋务运动时期浙江海防 49

二、中法战争时期浙江海防的短暂加强 56

三、镇海口保卫战 63

四、清末有海无防的海防体系 65

第三章 口岸城市与港口贸易 70

第一节 沿海口岸的相继开放 70

一、开埠前的港口与港口贸易 70

二、宁波、温州、杭州相继开放 76

三、轮船航运业的兴起 83

第二节 口岸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91

一、宁波“外国人居留地” 91

二、杭州日租界 95

三、城市建设与拓展 98

第三节 港口贸易 104

一、开埠后宁波港贸易（1844—1877） 104

二、温州开埠后浙江对外贸易（1878—1896） 110

三、杭州开埠后浙江对外贸易（1896—1911） 114

第四节 通商口岸的地域市场及变迁 120

一、五口通商时期宁波港的港口腹地 121

二、温州开埠与地域市场变化 125

- 三、杭州开埠与地域市场变化 127
- 四、口岸贸易对地域市场的影响 131

第四章 民族工商业与新式商人群体的兴起 137

- 第一节 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 137
 - 一、浙江近代民族工业的萌发 137
 - 二、甲午战争后出现的办厂热潮 140
 - 三、1900—1911年民族工业发展小高潮 144
 - 四、民族航运业与现代金融业的创建 147
- 第二节 浙江新式商人群体的兴起 150
 - 一、买办的崛起 150
 - 二、宁绍钱帮的发展 156
 - 三、湖商的兴起 162
- 第三节 宁波商帮的近代转型 166
 - 一、经营行业的转型 168
 - 二、在“新”与“旧”之间 177

第五章 海洋经济与沿海开发 184

- 第一节 晚清时期浙江的海洋渔业 184
 - 一、传统海洋渔业经济状况 184
 - 二、海洋渔业的近代变革 191
- 第二节 晚清时期浙江海洋盐业 202
 - 一、海洋盐业的工艺与革新 203
 - 二、晚清浙江海洋盐业管理 207
 - 三、海洋盐业产量、价格与税收 210

第三节 海塘修筑与沿海土地开发 214

一、海洋灾害及其影响 214

二、海塘修筑 218

三、沿海垦地的开发与利用 222

第六章 西方宗教传播与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 228

第一节 西方宗教在浙江沿海传播 228

一、基督教在浙江的传播 228

二、传播的方式及特点 234

三、文化冲突与民教纠纷 237

第二节 近代教育体系的初建 245

一、教会学校：近代教育的萌动 245

二、新式学堂：近代教育的本土化开端 251

三、漂洋过海：浙籍留学生 257

第三节 初具雏形：近代文化卫生事业 263

一、出版业 263

二、报刊业 267

三、新式医院的设立 272

四、防疫与公共卫生 275

第四节 风从海上来：民俗民风的变迁 279

一、海神信仰与婚丧习俗 279

二、生活方式的变化 283

三、四海为家：人口流动与重商风气 287

主要参考文献 291

后 记 310

第一章

浙江沿海自然环境与沿海地域社会

第一节 开埠前浙江沿海环境、资源与交通

浙江是中国的海洋大省，拥有的海洋面积是陆地面积的 2.60 倍，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的海岛有 3061 个，是全国岛屿最多的省份；海岸线总长 6400 多公里，居全国首位，其中大陆海岸线 2200 公里，列全国第 5 位。浙江辽阔的海域、漫长的海岸，造就了相对独特的海洋环境。

一、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不仅提供了人类生存与活动的场所，也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资料，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社会活动和发展。

（一）地理环境

浙江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背靠大陆，向西连接安徽、江西，北邻江苏、上海，南接福建，东面大海，省境陆地轮廓呈六角形。全省地形受地质构造的内外力作用，呈现出自西南向东北呈阶梯状倾斜，西南以山地为主，中部以丘陵为主，东北部是低平的冲积平原山地、丘陵约占省境面积的 70.40%，平原和盆地占 23.20%，而河湖水面占 6.40%，陆地表面结构特征常被概括为“七山一水二分田”。^①

^① 参见陈桥驿、臧威震、毛必林：《浙江省地理》，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3 页。

除了多山少地的陆地，浙江还拥有资源十分丰富的海洋。北起金沙湾，南到虎头鼻，22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曲折绵长，形成了独特的沿海地貌。中国沿海地貌依照海岸地貌类型可分为：基岩港湾淤泥质海岸、基岩港湾沙砾质海岸、淤泥质平原海岸、沙砾质平原海岸、三角洲海岸、断层海岸和珊瑚礁海岸。^①浙江沿海的地貌属于基岩港湾淤泥质海岸，近海地形以水下台地和浅海平原为主。在地质作用的影响下，浙江沿海地区形成了许多优良的港湾，如杭州湾、象山湾、三门湾、乐清湾、温州湾等，以及肥沃的滨海平原，如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等。有学者将浙江沿海地貌分为杭州湾区、浙东滨海区、沿海岛屿区等三个区域。^②其中酷似喇叭口的杭州湾区是钱塘江的入海口，有养料丰富的泥沙，形成了土地肥沃的杭嘉湖平原；而浙东滨海区的特点是丘陵海岸，基岩港湾和小型河口平原相间排列，岸线曲折，港湾众多，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沿海岛屿是板块碰撞的结果，浙江沿海岛屿众多，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散布于浙东近海地区，是海洋运输的前沿阵地，并拥有丰富的渔业和盐业资源，亦为渔民出海捕鱼提供了便利的活动场所。

漫长的海岸给浙江带来了广阔的海域发展空间，向东出海可达朝鲜、日本以及南洋诸国，历来是国家对外贸易和海防的前沿阵地，经济和军事位置极其重要。此外，浙江沿海地区多入海河流，如钱塘江、甬江、甬江等，形成了密集的河网，内河航运便利，有助于江南富庶地区的物资流转，漕运价值亦比较突出。

（二）气候环境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是分布在亚热带大陆东岸的一种特殊的气候，四季分明；光照较多，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受亚热带季风气候控制，浙江沿海区域，冬季盛行西北风，气温较低，降水量相对较少；夏季盛行东南风，从海洋上带来充足的水汽，降水量大。温和湿润，非常适合农业生产；四季分明的气候则有利于沿海鱼盐的晾晒、运销。另外，沿海洋流对近海渔业和盐业资源的利用、开发也有很大的影响。浙江海域是一个多种洋流

① 参见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

② 参见李家芳：《浙江省海岸带自然环境基本特征及综合分区》，《地理学报》1994年第6期。

系统交替消长的区域。“直接影响浙江海域的海流有黑潮及其分支台湾暖流、黄海冷水团和江浙沿岸流。黑潮及其分支台湾暖流是高温、高盐水系，春夏间分为内、外两路流经浙江海域后北上；黄海冷水团及容纳了江河入海径流的江浙沿岸流则是低温、低盐水系，于秋末开始南下直至福建。”^①不同温度、盐度的海流在浙江海域交汇和交替的消长，给沿海鱼类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盐度较高的海水又为海盐的生产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资源。优良的气候状况使浙江沿海地区成为环境条件比较复杂、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海区。

总之，背山面海的优越的地理位置，温和适宜的气候状况和独特的地质构造，使得浙江沿海资源相当丰富，为沿海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足够的活动空间。

二、沿海资源

浙江省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宋元以来就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司马迁曾赞誉古越之地：“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②明朝梦觉道人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则称：“浙江一省，杭、嘉、宁、绍、台、温都边着海。这海里，出的是珊瑚、玛瑙、夜明珠、砗磲、玳瑁、鲛鲛。这还是不容易得的对象，有两件极大利，人常得的，乃是鱼盐。”^③清代学者也有这样论述：“浙西蚕桑之利，浙东鱼盐之饶，与江苏相伯仲，故东南财赋必数浙江。”^④这些表述虽有文人的夸张笔法存在，但都展现了浙江丰富的自然资源。

（一）渔业资源

浙江地处东海之滨，海岸线较长，历来就是捕捞海洋鱼的重要基地。浙江沿海多有入海的淡水河，如钱塘江、曹娥江、甬江、椒江、甌江、飞云江、鳌江等。

① 中国农业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等编：《中国农业全书·浙江卷》，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1页。

②（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67页。

③（明）梦觉道人、（明）西湖浪子辑：《三刻拍案惊奇》第25回《缘投波浪里 恩向小窗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316《舆地考》十二《浙江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这些流入海洋的大陆河，水质肥沃，生物饵料丰富，冲淡入海口的海水盐度，形成了多种鱼类、虾类的产卵场所，形成了许多产量颇丰的优良渔场，如象山的爵溪渔场、石浦渔场，舟山的沈家门渔场、洋山渔场、岱山渔场、陈（嵊）山渔场，台州的临海渔场、黄岩渔场、宁海渔场，宁波的大目洋渔场等。渔场之于渔业犹如田地之于农业，“盖渔业性质与工商业迥异，为独立之产业，必先由一定之渔场，始可采捕。故渔场又可成为渔业生产之基本”^①。

浙江沿海的鱼类十分繁多。据考古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中的水生动物有海龟、中华鳖、鲸、鲟、真鲨、鲤鱼、鲫鱼等。^②明朝的梦觉道人曾这样描述浙东沿海富饶的渔业资源：“每日大小鱼船出海，管甚大鲸小鲛，一罟打来货卖。还又有石首、鲳鱼、鳙鱼、呼鱼、鳗鲡，各样可以做鲞；乌贼、海菜、海僧可以做干；其余虾子、虾干、紫菜、石花、燕窝、鱼翅、蛤蜊、龟甲、吐蛭、风饷、蟾涂、江蟪、鱼螺，那件不出海中，供人食用、货贩。”^③据弘治《温州府志》记载，仅温州一带的鱼类资源就有70余种。^④康熙《宁波府志》卷二《物产》“鳞之属”也记载了包括石首鱼、鳙鱼在内的50余种水产品。渔民们“随潮进退，采蚌捕鱼，其蚌蛤之属，目所未见耳所未闻，品类数百，难可尽言”^⑤。

随着沿海捕鱼业的发展，许多农民也加入到渔业生产行列，出现了身兼渔农两职的民众。他们在渔汛时期打鱼，汛期结束后从事农业生产。例如在镇海，每到黄鱼汛期和乌贼渔汛期，农民便纷纷加入捕捞阵营，汛期结束后，“除渔户终年捕鱼外，农民仍归垄亩”^⑥。每年鱼汛期，当地渔业一片繁忙，“渔船出洋，乘潮捕鱼，不避风浪”，招宝山下“橈帆如织，四房商贾争先贸易”，如遇夏季天气炎

① 王刚编著：《渔业经济与合作》，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4页。

② 参见傅璇琮主编：《宁波通史·六朝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③（明）梦觉道人、（明）西湖浪子辑：《三刻拍案惊奇》第25回《缘投波浪里 恩向小窗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参见（明）王瓚、（明）蔡芳编：弘治《温州府志》卷7《土产·海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4页。

⑤（清）李卫、（清）嵇曾筠等修：雍正《浙江通志》卷103《物产》三，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刊本。

⑥（清）王梦弼修：乾隆《镇海县志》卷3《风俗》。

热，渔民“置窖藏冰，以为明岁渔期之用”。^①至嘉、道时期，镇海解浦的大流网船达 300 余艘，作业渔场北起山东石岛，南至温州、台州外侧海域。

渔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浙江沿海水产品交易的兴盛。每当渔汛季节，一些重要城镇渔船云集，渔商纷至沓来。例如，宁波城区三江口一带渔船密集，半边街沿江岸有数十家鱼行，江东的后塘街也布满鱼摊，正所谓“千万鱼叠水涯，常行怕到后塘街，腥风一市人吹惯，夹路都将水族排”^②。

（二）盐业资源

在传统社会中，盐业是支撑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产业部门，盐课的收入，从南宋起，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明清时期，朝廷为满足国家需要，对盐业的生产和运销控制更加严格。由于海盐生产居当时池盐、井盐、土盐等四大盐类生产之首，所以朝廷极其重视。浙江沿海地区的海盐业及其发达，这得益于它丰富的海盐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

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大片滩涂，其地理条件非常适合进行盐业生产。温暖湿润的气候，对植物生长十分有利，煎盐所需的大量柴草有保证。浙江沿海还有大量“荡地”——濒海滩涂地。清人叶梦珠对荡地曾有这样的描述：“沙滩渐长，内地渐肯，于是同一荡地，有西熟、有稍熟，有长荡，有沙头之异。西熟、稍熟可植五谷，几与下田等。既而长荡亦半堪树艺，惟沙头为芦苇之所，长处海滨，殆不可计。萑苇之外，可以渔；长荡之间，可以盐。”^③这里所谓的“西熟”是指开垦较早的熟荡，因位于东向外延荡地的西部，故以方向名之。明清时期是我国沿海荡地大规模开发的重要时期。沿海荡地的开发分别由濒海都转运盐使司及盐课提举司、卫所屯军和地方府县三个系统共同完成，并受到严格的控制。在煎盐作业的盐场，荡地主要是煎盐燃料——柴草的供应地，进行盐业生产的民户叫灶户，灶户与荡地的结合是沿海荡地开发、海盐生产的重要条件。经过历代荡地的开发整顿，浙江盐场迅速发展，并在乾隆年间达到了鼎盛。盐场

①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84—785 页。

②（清）李邕嗣：《鄞东竹枝词》，《臬堂诗文集》（下），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③（清）叶梦珠撰，来新夏点校：《阅世编》卷 1，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85 页。

由顺治时期的 23 场、雍正时期的 25 场，增加到乾隆时期的 32 场。^① 钱塘江河口两岸的盐场，特别是南岸盐场和温、台、宁沿海盐场发展更为迅速，其中余姚盐场后来成为浙江省最大的盐场。

当然，浙江沿海盐业资源的开发并不是一帆风顺。清朝初年从顺治到康熙时期，由于沿海地区战乱不已，“宁波、温州、台州三府，沿海十五场，商灶逃窜，庐舍多墟”^②。顺治十八年（1661）开始的迁界政策，使这三幅盐场被弃于界外，“场灶既废，引地空悬”，“灶无煎办，商无买补”。康熙时期的三藩之乱，又使得金华、衢州、严州等地干戈遍野，盐商遭到袭劫。虽然如此，浙江的盐业在清代总体上还是在不断增长的。据乾隆十八年（1753）奏销册计算，当时两浙年行正引、票引盐达 2.8975 亿斤，比顺治时增加近一倍。盐课税额收入也由年 23 万余两增加到 73.77 万余两。这仅仅是正引、票引盐税，余引盐税尚未计算在内。^③

（三）海涂资源

浙江境内水资源十分丰富。沿海地区的杭嘉湖平原和浙东滨海平原（萧绍平原、姚江平原、温黄平原等），水网密布，湖泊繁多；钱塘江、甬江、瓯江等水系覆盖全省，其境内农业皆受其水资源的恩泽。但浙江的水资源利弊并存，水旱灾害也时常发生。就沿海地区来说，最大的水患来自于海潮的侵袭。自唐宋以来，沿海民众就开始重视海塘修筑，以减少海潮对沿海居民生产和生活的侵扰。浙东的上虞、余姚、慈溪、镇海、鄞县、象山、乐清、舟山，以及宁海、黄岩、温岭、三门、温州、瑞安、平阳、苍南、玉环等地，皆建有大小不一的海塘。清代加大了海塘修筑力度，如上虞段清代修过三次，其中雍正三年到四年（1725—1726）建成无桩基的石塘 1467 丈。余姚、慈溪段，雍正二年至四年（1724—1726）建成榆柳石塘 1300 丈；乾隆十三、十六、二十七（1748、1751、1762）年先后以工代赈，筑成济塘 3400 余丈；嘉庆年间又修筑了五塘、六塘等。镇海段在清代修筑了后海塘、涨河塘等。温州则建有永强的长安塘、北山塘，瑞安的新横塘，平阳的

① 参见叶建华：《浙江通史·清代卷》（上），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6 页。

② 参见叶建华：《浙江通史·清代卷》（上），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5 页。

③ 参见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1—303 页。

江口塘、下横塘、宋埠塘、新塘，乐清的十一塘、山屿塘等。^①海塘的修筑，既有效地护卫了沿海地区民众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又新增了不少土地，减轻了人口增长的压力。《清史稿》指出：“于滨海卫以塘，所以捍御咸潮，奠民居而便耕稼也。……清代易土塘为石塘，更民修为官修，巨工累作，力求巩固，滨海生灵，始获乐利矣。”^②

三、沿海交通

明清时期，江浙一带的商品经济比较繁荣，民众的商品意识也日益浓郁。明朝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浙江地区的民风进行了描述：本地“以商贾为业”，滨海之民“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杭嘉湖一带养蚕之家“桑月，夫妇不共榻，贫富彻夜搬箱摊桑”。^③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场形成和拓展，也推动了交通网络形成。明清时期，浙江的陆路交通网络更加严密，驿站制度更为完善；水路航运也有较大发展，除江南运河、浙东运河以及钱塘江、苕溪、甬江、瓯江、飞云江等自然河道的航运条件均有较大改善外，海路航运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明代学者张瀚在论及浙江沿海交通时写道：“浙江右联圻辅，左邻江右，南入闽关，遂达瓯越。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山川秀丽，人慧俗奢，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实啬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苧之所出，四方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缙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宁、绍、温、台并海而南，跨引汀、漳，估客往来，人获其利。”^④在这里，张瀚提及了浙江水陆交通的主要路线：陆路交通以浙东和浙西两条线为主干，水路交通既有内河航运，又有以宁、绍、温、台为交通要地的沿海航运。

① 参见钱塘江志编纂委员会编：《钱塘江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470页。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28《河渠》三，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815页。

③（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

（一）陆上交通

明清时期，由京畿通往全国各省城的驿道，称为“官马大道”或简称“官道”；由省城通往省内重要城市的道路叫官路支路，又称“大路”。这些官道或大路沿途多为商业发达地区，因此又是重要的商路。清代浙江境内的“大路”主要有两条：一为天台官路，由绍兴、嵊县、新昌、天台至临海；一为温州官路，由衢州、龙游至遂昌、松阳，经瓯江过丽水至温州，但也有走兰溪—金华—永康—缙云—丽水—温州线。这两条“大路”沟通浙江东西，并与沿海交通的重要结点相连。

除此之外，浙江还有通过驿站联结起来的沿海陆上交通道路。驿站是中国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清代浙江陆路交通驿站比明代有所增加。据统计，明代全国驿站数为 1000 到 1300 个左右，浙江境内为 30 到 40 个左右。到了清代全国驿站发展为 2000 个左右，浙江驿站有 60 个左右。^①其中浙江沿海地区的有：蓬莱驿、会稽县驿、上虞县驿、余姚县驿、姚江驿、慈溪县驿、鄞县县驿、思明驿、奉化县驿、宁海县驿、朱家岙驿、临海县驿、赤城驿、桑洲驿等。驿与驿之间的联系就构成了陆路交通的主要路线，这些驿站因此也就成了浙江沿海陆上交通的重要结点。

（二）水路交通

浙江沿海的水路交通可分为：沿海内河航运、近海航运和远洋航运三类。

1. 内河航运

内河航运是浙江沿海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清朝实行海禁政策时，沿海地区的交通主要依靠内河航运来实现的。清代浙江的水路航运网基本沿袭明代，仍以钱塘江、苕溪、甬江、灵江、瓯江、飞云江等自然河道以及江南运河、浙东运河为主要内河航道。这些河道在清代均得到过多次治理，使得航运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明代徽商黄汴编纂的《天下水陆路程》和清代詹漪子编纂的《天下路程图引》两书均较为全面地记述了当时的水路交通状况。据记载，当时杭州

^① 参见叶建华：《浙江通史·清代卷》（上），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3 页。